

# 唐詩之「因」「革」

紀庸

陳寅恪先生把唐代的政教淵源分爲兩個系統：一是繼承北朝

關中本位政策的餘緒，而襲取其保守的文化；一是南朝的文士風氣遺響所形成的文詞之士，通過了進士科的考試而掌握政權，這一派是革新的，尤其多善爲詩。⊙這個說法差不多已成定論。在學術史上本來北主保守而南主革新，譬如羣經傳注，北主馬、鄭之學，而南方則流行王弼、何晏的玄風。到隋，「政治則南統於北，學術則北統於南」，⊙可以看出學術革新的風氣是很難抵禦的。據陳氏說：唐初一百五十年，完全是關隴集團的勢力，到則天皇后以後，這勢力漸被摧毀，中經天寶之亂，益復不振，政權遂轉入詞臣手中。細想起來，文學思潮，大致亦復如此。這種風氣的造成，也許和民族的地域性有關。北地多山苦寒，民性凝重保守；南方則多水而和暖，民性流動飛揚；想來不會大錯罷？唐初的文學理論如李百藥「北齊書」「文苑傳敘」：

江左梁末，彌尚輕險。始自備官，刑乎流俗。雜沾滯以成音，故雖悲而不雅。爰逮武平，政乖時憲。唯藻思之美，雅道猶存。履柔順以成文，蒙大難而能正。原夫兩朝叔世，俱肆淫聲；而齊氏變風，屬諸絃管。梁時變雅，在夫篇什，莫非易俗所致，並爲亡國之音。……

魏徵「梁論」

「簡文帝」文體用寡，華而不實；體窮淫靡，義罕疏通；哀思之音，遂移風俗。

又其「隋書」「文學傳敘」云：⊙

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，啓其淫放；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鱗。其義淺而繁，其文匿而采。調尚輕

險，詞多冥思。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？

令狐德棻「周書」「庾信傳贊」云：

子山之文，發源於宋末，盛行於梁季。其體以淫放爲本，其詞以輕險爲宗，故能奪目侈於紅紫，蕩心逾於鄭衛。昔揚子雲有言：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。」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詞賦之罪人也。幾乎全是反對齊、梁的。當然，這種風氣，從隋時就有了，如文帝時李諤上書是衆所週知的。但隋年代不長，自然不如唐代的被重視。但理論雖是如此，事實則從帝王以至大臣，都難免受了齊、梁文學的薰染，而作着所謂「豔體」以及「輕薄」的詩歌；如唐太宗及初唐四傑，乃是其最著者。

所以如此，並非是齊、梁詩全是輕險浮豔，實因其革新的空氣，不知不覺之間，易爲富於感情的詩人所接受之故。試看他們的文學理論：

夫文豈有常體？但以有體爲常，政當使常有其體。丈夫當刪「詩」、

「書」，制禮樂，何至因循寄人籬下？（張融「問律自序」）

夫楚謠、漢風，既非一骨；魏製、晉造，固亦二體。譬猶藍朱成彩，雜錯之變無窮；宮商爲音，麗曼之態不極。（江淹「雜體詩序」見「初學記」「文章」部引）

若無新變，不能代雄。（蕭子顯「南齊書」「文學傳論」）

今世皆律諧靜，章句偶對，諛避精詳，賢於往昔多矣。（「顧氏家訓」「文章篇」）

在這種偏重「革」的理論之下，文學作品自然會走入「新」「奇」一路，「文心雕龍」所謂「爭價一句之奇」，「辭必窮力而追新」便是。又如江淹「自序傳」說自己「愛奇尚異」。張融「臨卒賦

子」說：「吾文體英絕，變而屢奇。」「詩品」說謝朓「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道。」「南齊書」陸厥傳說他「少有風概，好屬文，五言詩體甚新奇。」以及前面所引「隋書」文學傳敘的「梁自大同之後，……爭馳新巧」，都可以作為當時作品特色的說明。明楊慎「升庵詩話」有云：「清者，流麗而不濁滯；新者，創見而不陳腐。」可以作「清新」的注腳，也就是六朝文學更具體的說明。杜甫詩：「詩清立意新」，（「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」）「清詞麗句必爲鄰」，（「戲作六絕句」）以及評論李白的「清新庾開府」，（「春日憶李白」）論孟浩然的「清詩句句盡堪傳」，（「解闕十二首」）都可以作為繼承六朝人詩論的例子。六朝詩所以有這種特色的原因，一是內容方面增加了賦的要素；二是形式上有了音律的自覺。

什麼是賦的要素？按照「詩經」六義的說法，賦就是「鋪陳其事」，<sup>①</sup>以體物爲主；而比、興則出自詩人的感情，以抒情爲主。一是客觀，一是主觀。陸機「文賦」說：「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以瀏亮」，對於這兩者的分野，說的最清楚。大致說來，齊、梁以前的建安詩，是以抒情爲主的，不大有體物之作；齊、梁以後則不然，「文心雕龍」明詩云：

宋初文賦，體有因革。「莊」「老」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體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。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；此近世之所競也。

皎然「詩式」：

建安不用事，齊、梁用事。

都是說齊、梁的詩有了賦的成分加入了。用事者，將抽象的心情，以具體的事實來表現，顯然這也是一種進步。開此風的當推沈約。「顏氏家訓」「文章」篇：「沈隱侯（即沈約，卒隱隱）曰：『文章當從三易：易見事一也；易識字二也；易讀誦三也。』邢子才常曰：『沈侯文章，用事不使人覺，若胸臆語也。』深以此

服之。』所謂「易見事」，自指用事易於明白，如「梁書」「王筠傳」：「沈」約於郊居宅造閑齋，筠爲草木十詠，書之於壁，皆直寫文詞，不加篇題。約謂人云：「此詩指物呈形，無假題署。」這也許便是易見事的標準，而其方法則主在體物。「詩品」云：「若專用比興，患在深；意深則詞顯。若但用賦體，患在浮；意浮則文散。」前者是指摘漢魏詩，後者則評論當時詩，但於此可見齊梁對漢魏的革命就是在於加入了賦的特色。

由於「賦」體的加入，詩的題材因而擴大，一是「詠物詩」，一便是「詩史」。詠物詩是繼承晉、宋間的山水詩而起的，「文心雕龍」「物色」篇云：

自近代以來，文貴形似。窺情風景之上，鑽貌草木之中。吟詠所發，志唯深遠；體物爲妙，功在密附。故巧言切狀，如印之印泥；不加雕削，而曲寫毫末。

正是說詠物體的特長。「玉臺新詠」所載詠物詩甚多，可以參證。初唐詩人如董思恭、李嶠也習染此風，至杜甫而傾向更強。「詩史」，有兩解：1. 詩與史，2. 以詩爲史。這裏所說，實指後者。齊、梁之詩，多委曲描摹事實，所以常稱詩史，此詞屢見於沈約「宋書」「謝靈運傳」、<sup>②</sup>蕭子顯「南齊書」「王融傳」等，雖然命意不似唐人說杜詩那麼明顯，在那時有這樣作詩方法，則無疑義。蓋當亂離之世，遭逢不偶的詩人，歌詠身世，彷彿屈子之作「離騷」，也是情理中應有之事。杜甫論庾信云：「庾信生平最蕭瑟，暮年詩賦動江關」，豈不也就因爲庾氏在亂離之中，不少憤慨亡國之作嗎？

上述兩種——詠物、史詩傾向，都以賦的方法爲其基礎，到唐而大爲流行。例如初唐駱賓王的「帝京篇」及閻朝隱的「鸚鵡貓兒詩」、張說的「安樂郡主花燭行」、盧照鄰的「長安古意」等篇，與其說是詩，毋寧看作短的賦。杜甫的「麗人行」、「哀王孫」、「北征」、「三吏」等，賦的色彩尤濃厚。即後來極端

攻擊齊、梁詩派力倡復古的韓愈，<sup>④</sup>他的「南山」一詩，能不說是賦體嗎？有人批評他「以文爲詩」，或說他的詩等於「押韻之文」，更爲明白。

什麼是聲律的自覺？四聲之說，起於沈約，人所共知。但我們推想，這事一定不是一個人的「發現」，而是聲音自然的趨勢。尤其從兩晉以來的西域僧徒，東來譯經，以西域及天竺語言原理分析中國的語音，可能是四聲發現的前奏。反切及韻書，都起自北方，足以爲證。<sup>⑤</sup>「詩品」云：「齊有王元長者，……嘗欲造知音論，未就。王元長創其首，謝朓、沈約揚其波。」也是四聲不起於沈約之徵。不過沈氏語音學的天才特高，故其成就最大。不信再看與沈同時的人，好些都會有過用雙聲疊韻說話的故事：

「南史」「謝莊傳」：「王元謨問：『何者爲雙聲？何者爲疊韻？』」答曰：「文讀爲雙聲，隔韻爲疊韻。」其捷速如此。」（按：玄禮又作懸弧，河南省地；隔韻今山東省地，皆宋、魏交戰要衝。）

梁元帝「金樓子」「捷對」篇：「羊戎好爲雙聲，江夏王（義恭）設齋，使我鋪舒坐法，戎處分曰：『官教前牀可開八尺。』江夏曰：『開牀小狹。』戎復唱曰：『官家恨狹，更廣八分。』」（皆雙聲）文帝與戎對曰：「金溝清泄，銅池漾洩，極佳光景，當得劃基！」（亦雙聲）

「北齊書」「魏收傳」：「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：『愚魏衰收。』」收答曰：「顏巖腥瘦，是誰所生，羊頤狗頰，頭團鼻平，飯房答籠，着孔嘲訂。」其辯捷不拘若是。」（「北史」同）

「洛陽伽藍記」五，凝圓寺條：「冠軍將軍郭文遠，遊憩其中，堂宇園林，匹於邦君。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，嘗經文遠宅前過，見其門闕華美，乃曰：『是誰第宅？』」（按四字雙聲）遇佳婢春風出，曰：「郭冠軍家。」（亦雙聲）元謙曰：「凡婢雙聲。」春風曰：「婢奴慢罵！」（皆雙聲）元謙服婢之能，於是京邑翕然傳之。<sup>⑥</sup>

也可以說明對音律的自覺，非止沈、謝，乃是當日一般的潮流。只是齊、梁人對音律的使用技巧，漸漸到了純熟的地步，這無非

對建安詩風表示革命，而達到其求「新」「奇」的目的。所以雖然當時會有人反對，畢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作品較爲優越。「樂書」「庾肩吾傳」引「簡文帝與湘東王和書」云：「謝朓、沈約之詩，任昉、陸倕之筆，斯實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」帝固反對聲律論者。又如「隋書」「文學傳序」雖然不滿意齊、梁作品，但也說：「江左宮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，……文華者宜於詠歌。」沈約曾說文章三易，其一是易誦讀，易誦讀不就是宜詠歌嗎？

這裏我們必須強調中國文字的「單音系統」的特質。惟其爲單音，故有對偶的可能；而且爲了聲調的緊接及同音字太多的關係，自然會產生四聲變化。這一變化的美化應用，即是駢儷體文字的出現，更進一步，便是詩的平仄。這完全是迎合了聽覺的興趣而來，鄭玄所謂「宮商上下相應」，（「毛詩」「大序」「義」）體機所謂「音聲之迭代」，（「文賦」）范曄所謂「性別宮商識清濁，斯自然也」，（「宋書」「范曄傳」）都是此理。至「文心雕龍」「聲律」篇就更加強調的說：「聲畫妍蚩，寄在吟詠」，把文學的美惡條件全寄託在聲音上了。

由於聲律說的浸淫，唐代詩歌的音樂化益加具體，那便是入樂詩「律體」和「絕句」的興起，這是一般文學史上都講到的。則天時代的沈、宋，尤爲律體領袖，而且從此「進士」科的詞人壓倒「明經」科的學者，直到唐末。<sup>⑦</sup>至於梁武帝的「江南弄」、沈約的「六憶」等篇，後世有認爲就是詞的起源者，那就和音樂的關係更深了。

如前所說，初唐文士大都在理論上是反齊梁、反聲律的，這本是演梁簡文帝、梁元帝及「詩品」的餘緒。梁元帝「金樓子」「立言下」云：「夫翠飾羽而體分，象美牙而身喪；蚌懷珠而割，蘭含香而遭焚；膏以明而自煎，桂以蠶而成疾；並求福而得禍，衣錦尙裝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可爲代表。但理論雖如此，他們作品的本身就是駢儷傾向很濃的，可以說是很好笑的矛盾。

看唐初，除去前舉四傑及唐太宗的「豔體」、「輕薄」之外，如李白，本是最反對齊、梁的萎靡詩風，而以復興「大雅」自任的，他曾說：「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。」而自許為「蓬萊文章建安骨」，然杜甫卻說他的詩體是清新的，詩句是仿效六朝的。例如稱他「為人性僻耽佳句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。」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」「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這不全是流傳人口、衆所習知的麼？好像李白也並未以為忤呢。李白的詩論，無疑的是受了陳子昂的影響，陳氏對於齊、梁之風，是深惡而痛絕之的，其與「東方左史糾修竹篇序」云：「文章道弊，五百年矣。漢、魏風骨，晉、宋莫傳，然而文獻有可徵者。僕嘗暇時觀齊、梁間詩，采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，每以永歎！竊思古人，常恐逶迤頹靡，風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」盧藏用為他的文集作序，說他「卓立千古，橫制頹波，天下翕然，質文一變。」可是事實上我們考察受他影響最大的李白，（李氏的「古風」完全襲取陳氏「感遇」）仍然是「長憶謝玄暉」，「一生低首祇宣城」的，那末，所謂「天下翕然，質文一變」的話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。

所以，我們大致可以斷言，唐代的詩歌，因襲六朝的「變革」者多，復返於漢、魏者少。即如陳子昂之流的絕對右派，皎然「詩式」也不過許他一個「復多而變少」罷了，到底不能不有些「變」的。對於一個新潮流，不能頑固的忽視，這也是一個例證，猶之關隴集團之不能和江南新進抗衡一般。大率任何一個新潮流的襲來，在初期總會遭到舊勢力的反對，文學史也不能例外。沈約的聲律論有簡文帝、元帝、鍾嶸等入反對，而北朝人士，尤抱反感，（唐初反齊、梁，似亦襲此風）但經沈氏及庾信等人的努力，新格律究竟到處風行了。慢慢的由極右極左兩派之中，就會產生一種折衷論，如顏之推即是一例。「顏氏家訓」「文章篇」云：

古人之文，宏材逸氣，體度風格，去今實遠，但緝綴疏朴，未為密緻耳。今世晉律諧靡，章句偶對，諱避精詳，賢於往昔多矣。宜以古之

製裁為本，今之辭調為末，並須兩存，不可偏棄也。

唐代詩歌，自起初便和理論方面的復古主義背道而馳，形成理論事實打成兩橛的現象，（主要也許因為關隴舊人多不喜且不善為詩）於流風所及，在理論上也就不不得不趨於折衷。請看下面所舉的話：

皎然「詩式」：「夫五言之道，唯工唯精。論者雖欲降殺齊、梁，未知其旨，若據時代，道喪幾之矣。沈約詩，詩人不用，此論何也？如謝吏部詩：「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！」柳文暢：「太液波起，長楊高樹秋。」王元長詩：「霜氣下孟津，秋風度函谷。」亦何減於建安？若建安不用事，齊、梁用事，以定優劣，亦請論之：如張籍詩：「王生臨廣隰，潘子赴黃河。」庾肩吾詩：「秦王觀大海，魏帝逐飄風。」沈約詩：「高樓切思婦，西園遊上才。」格雖弱，氣韻正遠，比建安可言體變，不可言道喪。大歷中，詞人多在江外，皇甫冉、嚴維、張繼素（？）、劉長卿、李嘉祐、朱放，竊占青山白雲、春風芳草以為己有，吾知詩道初喪，正在於此！何得推過齊、梁？」

獨孤及「昆陵集」卷十三「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君集序」：「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，廣於「離騷」，著於李、蘇，盛於曹、劉，其所自遠矣。當漢、魏之間，雖已朴散為器，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，以今揆昔，則有朱絃疏越、大羹遺味之歎！歷千餘歲，至沈詹事（詹）期、宋考功（之問）始裁成六律，彰施五色，使言之而中倫，歌之而成聲，緣情綺靡之功，至是乃備。雖去雅喪遠，其麗有過於古者，亦猶路豷出於土鼓，篆籀生於鳥跡也。」

劉勰「舊唐書」「文苑傳敘」：「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，莫不盡章「謨」、「誥」，祖述「詩」、「騷」；遠宗毛、鄭之訓論，近師班、楊之述作。……殊不知世代有文質，風俗有浮醜，學識有淺深，才性有工拙。昔仲尼演三代之「易」，刪諸國之「詩」，非求勝於昔賢，要取名於今代。實以淳朴之實傷質，民俗之語不經；故飾以文旨，考之絃誦；然後致遠不泥，永代作程；即知是古非今，未為通論。」

在議論上雖不過於激烈，在骨子裏卻有點左傾。宋詩之由西崑演成范、陸，明詩之由七子變為公安，都同此理。

足以代表傾向南朝作風的詩人，當然要數杜甫，他的仿效

齊、梁，記述亂離，稱為「詩史」，已見前述。他個人對於江左流風，也時致傾挹。「偶題」：「永懷江左逸，多病鄴中奇」，顯然菲薄建安而推崇齊、宋。因而他最喜研誦的書便是「文選」，他常說「呼婢取酒壺，課兒誦『文選』」，「精熟『文選』理」一類的話。他所仿摹的人物，則為「熟知二謝能將事，頗學陰何苦用心。」即對於一般人嗤為「輕薄為文」的四傑，也頗有好感，而罵那些淺人「爾曹身與名俱裂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了。

杜氏之特別注意詩律，完全是受沈、謝影響，其目的亦仍是為了達到清新，所謂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，「賦詩新句穩，不覺自長吟」，「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辭麗句必為鄰」，都提明「新」字。又如「遺辭必中律」，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，更是自述甘苦的經驗談。王楙「野客叢書」卷十九杜詩合古意條，詳舉杜詩脫胎齊、梁之例甚多，讀者不妨參照。他對於當代成名的作家，也都以齊、梁的詩人相比擬，尤可看出他對南朝的傾倒。總之，唐詩的來源，對於齊、梁體，因多革少，是可以確定的。

① 詳見陳氏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、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」二書。

② 皮錫瑞「經學歷史」（「學生國學叢書」周氏注本）及周子同「經今古文學」。

③ 舊唐書「令狐德棻傳」稱徵修「隋史」，徵傳則稱孔穎達、許敬宗作，唯敘論皆徵作。

④ 朱熹「詩集傳」。

⑤ 「謝靈運傳」：「至於先士茂製，飄高麗，……並直舉胸情，非傍詩史。」按此文日本僧空海「文鏡秘府論」以為應作「並宜舉胸懷，作傍經史」，恐非是。此所云殆正指富於紀事而缺於抒情的詩篇，否則詩史對舉，於此不辭。若「南齊書」「王融傳」：「今經典遠被，詩史北流」，則顯屬對舉，言詩與史也。

⑥ 韓愈「薦士」：「齊梁及陳隋，著作等輝燦。」

⑦ 陸法言「切韻」為中國最早韻書，但隋代之前，已有許多因釋經而產生的「音義」之書。「開元釋教錄」：「昔高齊沙門釋道慧，為『一切經音』，

做字直反，曾無追順。」此為支應、難琳諸書的先聲。其年代雖比沈約為遲，但我們可以推斷外國僧祇是早已會了這個方法。一如後來明代天主教傳教士入中土，首先學習以拉丁字、羅馬字拼中國音，如金尼閣的「西儒耳目資」等。

⑧ 自宋代始，詩人已知用雙聲疊韻之字為詩，如謝靈運「從斤竹澗越嶺西行詩」：「蘋華泛沈澗，菰蒲昌清淺。」趙照「登廬山」：「嘈囀晨鳥思，叫嘯夜猿清」等是。宋魏慶「詩人玉屑」引「詩苑類格」舉雙聲疊韻對偶例甚多，此不贅。

⑨ 詳見陳寅恪氏二書。關隴集團之奮派頗重經科，南方新進之士則重進士科，進士科是專講詩賦的。到進士科的新進分子當權時，把明經科看得不成東西，因有「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」之說，而且有許多人中了明經又考進士。

⑩ 尤袤「全唐詩話」：「魏建安後迄江左，詩律屢變。至沈約、庾信，以音韻相婉附，屬對精密。及宋之間，沈佺期，又加靡麗，迴忌聲病，約句準篇，如錦繡成文。學者宗之，號為沈、宋。」

⑪ 「詩品」：「不被管絃，又何取聲律邪？」又「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。」

⑫ 「周書」「蘇綽傳」：「自有晉之季，文章競為浮華，遂成風俗。太祖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廟，羣主畢至，乃令綽作大誥奏行之。……自是之後，文章皆因其體。」北周文諧皆學「尚書」，極詰屈聲牙之致。

⑬ 孟榮「本事詩」：「杜逢祿山之難，流離離蜀，畢陳於時。推見至隱，殆無遺事。故當時號為詩史。」

⑭ 「新唐書」「杜甫傳贊」：「甫又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號詩史。」

⑮ 如「軍經昭陵」：「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」，本於庾信「周宗廟歌」：「終封三尺劍，長卷一戎衣」；「宿江邊閣」：「薄雲巖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」，本於何遜「入西塞示南府同僚」：「薄雲岩際出，初月波中上」，秦州雜詩：「月明垂葉露，雲逐渡溪風」，本於陰鏗「開善寺」：「鶯隨入戶樹，花逐下山風」；「題趙氏隱居」：「伐木丁丁山更幽」，本於王籍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等，不勝枚舉。

⑯ 如張九齡：「絳衣玄暉擁。」（「八哀」）岑參：「謝朓每篇堪輿。」（「寄岑嘉州」）孟浩然：「往往凌鮑謝。」（「道興」）高適：「岑參：高半殊緩步，沈鮑得同行。」（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」）李白：「高適：不復見顏鮑。」（「遺懷」）王綸：「新文生沈謝。」（「吳王彭州綸」）畢曜：「流傳江鮑體。」（「贈畢四曜」）（完）